

# 百岁钱李仁: 忠于理想的那束光

◆ 李泓冰

老同事来电,说8月20日,是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虚龄百岁的大日子。

仁者寿啊!一时间百感交集。

很喜欢和老人聊天,年轻时是张“白纸”,能把长者的思想变成新闻,算是“取巧”。而今关注的,是向世纪老人打捞历史的细节。他们,已然成为大历史的一部分。

对老钱,有肃然起敬,也有一种温暖——他们代表的一代理想主义者,以及他们肩负起的百年历史,还生动地存在着,呼吸着,支撑着我们。

“他们忠于理想,不停地追求理想,忠诚地、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、追求下去,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。”巴金赞美过的,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,我想其中应该包括老钱。

这束“光”,无远弗届,也包括离他八丈远的我。



▲ 解放初,青年钱李仁与夫人郑韵,在富民路上海团市委院子里的合影 钱云飞 供图  
◀ 8月17日上午在寓所楼下 钱云飞 供图



■ 20世纪80年代,钱李仁在社长办公室

## 喜欢别人叫他“老钱”

说起来,我和老钱——对,他爱听别人叫他“老钱”,某次饭桌上,有人不顾他的提醒,一直称呼“钱老”,他很不开心——是一同走进金台西路2号大院的,我还比他早了四个月。当然,地位判若天壤。我是就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,当时这个系,因“文革”结束后新闻人才青黄不接,主要为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国日报培养“新血”,上课、起居,都在人民日报大院9号楼。我们和人民日报的大记小编,也就走同一条路、去同一间食堂吃饭。

1985年12月的一天,餐桌上有师兄指点:看呐,新社长钱李仁来打饭了!那是一位头发花白、个子不高的长者,笔直的腰板让人印象深刻。大家议论起他在全社职工大会的履新讲话,“除了一位秘书兼司机,我一个人也不带进报社!”并承诺秉公办事,一碗水端平,不会任人唯亲。

这话,磊落,且自信。

那个大院,有点没大没小。年轻人和社领导碰上闲聊几句,或偶尔在食堂一张桌上吃饭,都习以为常。我就曾经在路上“捡”了一位说没吃午饭的总编辑,带他到集体宿舍7号楼,和舍友一起用楼道里“非法”的煤气罐,下了一大碗速冻水饺,老总吃得挺香——他叫老范,范敬宜。

而老钱,和我所在的教科文卫办公室,在三楼同侧。一次,因为对本报有篇引发争议的评论不甚理解,傍晚,路过老钱办公室,门虚掩着,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,正播着那篇评论,便忍不住敲门,听到“请进”,便走进去直抒胸臆。老钱听我说完,不响。把目光转向电视机,说:一起看看新闻吧!

他退休后,有次来上海,我向他提起此事,他笑,我能和你们小孩子说什么呢?他还说起,女儿也姓李,我很奇怪。他笑说:“‘文革’时,女儿觉得,文艺作品中姓钱的都是坏人,就跑到派出所改名,用我名字中的第二字,做了姓氏。”

老钱对年轻人宽厚,律己却甚严。

我的研究生同学、文艺部的袁晔说,老钱有次打电话问,能不能给几张演唱会的票,“过了两天,老钱要交钱,说是女儿去看的。”在报社电信室,袁晔遇到老钱也在交电话费,说他上个月有两个上海长途电话,是私事。被这样平实宽容的大领导“惯



坏了,在形形色色的采访中,我一直“没大没小”。然而所遇到的大领导,似乎都不以为忤。

## “如果打官司,我钱李仁上法庭!”

有件轶事,我听亲历者、华东分社老领导吴长生说过N次。

那是1988年,记者蒋亚平花3个月采写的调查报道见报——《“丰收”的折扣》,批评北京某郊县在推行规模经营旗号下,动摇包产到户政策,虚报粮食产量。为了搞规模经营,撕毁了与农户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……

这下捅了大马蜂窝。县领导威胁说,会有20万农民到报社抗议。北京市主要负责领导也要求报纸发文更正。

老钱叫来时任经济部农村组负责人吴长生,详询报道依据是否充足。

吴长生送上记者的采访笔记等一大摞资料。老钱窝在办公室整整看了一天,踏实了,对吴长生说,“我告诉你一句话:如果打官司,我钱李仁上法庭!”

面对重重压力,老钱坚持,报道是根据一线农民的诉说写成,基本事实准确,没有捏造。应该严格执行中央政策,维护合同的严肃性,保持家庭联产承包制稳定,保护农民合法权益,切实纠正不当做法。

吴长生说,在危害农村基本政策的行为面前,确实不能退,否则会在全国造成灾难性后果,我们有过历史教训。

这件事,让我深受震撼的一点是:真实是新闻的生命,也是对记者而言最可倚仗、最牢不可破的有力保护。

还有则反例。有则一版报道《中南海里购股票》:“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,汇集了很多,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用过的东西——股票……”一时哗然。老钱经过调查,发现只是在西安门大街某国家机关大院试

发售金杯汽车股票,并不在中南海,报道明显失实。老钱指示在同样醒目的位置,发了更正。

对新闻真实性的正反两“鞭”,让我铭记了一辈子。

老钱在回忆录《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》中记载了一件事。报上刊发呼吁关爱改革者、不要吹毛求疵的系列报道,他和编辑商榷,“尽量不用或少用‘改革者’这个词”,人为划线,会导致“另一部分人被认为是‘非改革者’甚至‘反改革者’”。那组报道,突出了沈阳电车公司总经理夏任凡。老钱后来自嘲:提醒并未得到重视。两年后,本报又刊发关于夏任凡的通讯,仍冠以“改革者”。

十余年后,老钱惊异地在报上看到:巨贪夏任凡终审被判死刑。他仔细摘录了这则报道,淡淡加了一句,“特附注于此”。

有的时候,新闻报道要用放大镜打量;有的时候,则要把年轮拉长了再掂量,方看得出新闻的质量和重量。政治家办报的水准,就体现在类似判断之中。这种判断,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。改革要有问题意识、过程意识,做新闻又何尝不是?不轻下定论,不生造概念,切忌“一好百好”“概念先行”,不让抽象去遮蔽具象,党报记者方能尊重事实,持中守正。

已成经典的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》《改革阵痛中的觉悟》(记者罗荣兴、曹焕荣、祝华新),也是经由老钱拍板,于1987年10月6日和7日推向头版连载。报道密集采访京沪两地一大批专家学者,系统梳理当年思想界对中国改革动力、特征、代价的理性思考,成为改革40年进程中的代表性新闻作品。

## 重建记者站,一大批优秀报道“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”

老钱有一项“政绩”,间接影响了很多记者的职业生涯,包括我。

1985年底,他刚到报社履新,很多老同志找他,强烈呼吁恢复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。从1958年邓拓社长因“书生办报、死人办报”调离后,次年人民日报记者站便与新华社地方分社合并,很不利于报社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力。老钱同新华社领导穆青协商,提出方案,1986年6月经中办、国办批转《关于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与新华社地方分社分开设立报告》。

老钱参加了9省市记者站的挂牌。很多地方党政一把手也出席了挂牌仪式,如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、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、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……此后,一版头条的地方新闻,每年一般都在100篇左右,“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,荣获全国新闻奖的优秀篇什更是不胜枚举”,老钱满是欣慰。

如上海记者站记者章世鸿1988年发表在头版的《一个城市两种速度说明了什么》,剖析上海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发展速度迥异的问题,对上海经济工作全局进行评述,《解放日报》次日转载,反响强烈;浙江记者站记者高海浩1988年采写《一人沉浮,千夫评说——步鑫生被免职后的种种议论》,第一次反思新闻界对典型人物的“捧杀”问题,引发全国讨论;西藏记者站首任站长卢小飞,于1987年夏先后采写了对访问西藏的美国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报道,科尔说,他见到的一切比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更好。到了2001年,广西记者站记者郑盛丰独家报道南丹瞒报重大矿难事件,时任总理说,“要不是《人民日报》……差不多上百人就要冤沉水底了”(见《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》)。

从记者站到分社,人民日报在各地影响力日益扩大。我自己也从北京调来上海,从华东分社到上海分社,一呆就是近30年。

## “现在想得最多的,就是上海这段岁月”

老钱的职业革命家生涯,是在上海启动的。

说起来,老钱还是“王孙”,唐末吴越王钱镠的后代。

抗战时,钱家从江苏镇江迁来上海公共租界的表亲处。14岁的他,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小文,陈述逃难途中“无限的痛惜、愤慨”,结尾写道:“轮船顺利地到了上海,战争的遗迹——断垣残壁仍旧留存着。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,都像贴上一张张膏药一样。踏上了‘孤岛’,又看见行人如蚁、车水马龙的升平景象了。”

为了补贴困窘的家用,他不断向上海报章投稿,这养成他关心时事和浏览报刊的习惯。1939年夏,他顺利考取上海中学高中理科,这年冬,他秘密加入“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”。后来,经上中同学吴绍基

介绍,他在望志路(今兴业路)吴家阁楼,举行了入党宣誓——距党的诞生地,仅一步之遥。

上中很多名师,让他的物理、英文、国文都大为精进。他同时积极投身地下革命,发展新党员。1942年,上中党员达50人,“爱国同学是开除不完的,散布的种子总会有萌发的时候”。在上海市学联党组工作时,他考入圣约翰大学,组织领导多起学生运动,“反会考”“抗议九龙暴行”,成为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,终于迎来解放。

2019年,他对来北京做专访的解放日报记者郭泉真说:“我现在想得最多的,就是当年上海这段岁月。”

## 建议搭建世界先进水平的“信息高速公路”

也许是上海的开放基因,给了老钱国际化视野。他是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历史机遇的高级领导干部。

1993年底,退休的老钱在本报刊发《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》,“在工业发达国家,新的支柱产业将不再出现一种新的支柱性制造业(例如像汽车工业那样),而很可能是‘信息产业’。”

他描述“信息高速公路”:如果你想欣赏一部影片,只要在家按几下电钮,就可以从电影资料馆直接传输到你家中的电视机屏幕上……这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,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,改变,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。

这是30年前的预判啊!当时绝大多数公众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。

次年,人民日报连载老钱的《从“信息高速公路”看美国信息业》,这时,离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还有2个多月。

他与何祚庥院士为此还争论了一番。

1995年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何文《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》:我国能使用和掌握家用电脑技术的恐怕还不到1000万人!何来使用电子通信的“巨大的需求”?

同日刊发老钱的商榷文章: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起点低,唯其如此,如能在建设起步时就能既脚踏实地,又瞄准世界先进水平,稳步向高标准前进,是有可能接近那种“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”的要求的。

我国在信息化道路上弯道超车,这位老地下党员功不可没。

由于和上海的情缘,老钱95岁之际,曾将回忆录捐给上图,握着上图颁发的“捐赠证书”,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而今,百岁老钱行动不便,说话也少了,常坐在轮椅上,和煦地浅笑。他的生命,韧成一根坚韧的丝线,串起了跨越两个世纪的版面和版面上的共和国史……